

再生

川東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七〇七號

第一五一二期

週刊

三十三年二月廿二日

中國民主社會黨參加四機構之聲明

傅斯年的呼聲

采

白禍重於黃禍

銘

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果能生效嗎？

餘

結束戰時財政

偉
晨

尼赫魯和真納 (George F. Jones 著)

陳
明
譯

勞工參政問題 (Jack Kroll 著)

靜
觀
譯

蘇中解放區及其他

還
俗

還鄉雜感 (續完)

龍
子

中國民主社會黨機關刊物之一

本期刊售五百元，每逢星期六出版，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九號三樓。

中國民主社會黨十五日聲明

為參加改組中之立法院監察院憲政實施促進會參政會等四機構事。

本黨自參加政協以來所致力者，為求中國之和平與民主，良以不和平不統一，一切政治之設施，財政之整頓，均無從着手，迨後，談判停頓，政府宣佈召開國民大會之日期，第三方面復鼓集南京，謀所以調解之道，其時烽烟滿地，捨先停戰外，不足以言和談，然一涉及停戰，則駐軍地點，地方政權等問題，又因之而起，於是因軍事而牽涉政治，政治復牽涉軍事，互相糾纏，無或已時；而中共對於國大之召開，既不同意原定日期，又不商洽另定日期，在此情形之下，政府既有意結束調政，制定憲法，對於走上民主，自為接近一步，故本黨提名國大，參加制憲工作，以期奠定民主政治之基礎；迨憲法告成，國內烽烟，仍未少息，政府以距離行憲日期，尚有相當時日，其有關行憲問題如選舉法及其他法律之制定等，均非調政時期之政府所能勝任，非待其他各黨派之參加與合作，不足以鑿全國人士之望，故決定改組政府，堅選本黨提名參加；本黨處此交替時期，對於可能參加之工作，惟有本合作精神，共圖實現，故參加立法院，與憲政實施促進會，自為義之所不容辭，監察院職務，對於過渡時期之政治，亦須有所糾正，參政會為戰時集思廣益之機構，各黨久已列席，所以參加之者，至此為止，期於納政治於民主與法治正軌，本黨幾經討論，認為既參加制憲，則對於行憲之準備工作，非參加不足以云盡責，故一致決議，參加改組中之立法院，監察院，憲政實施促進會及參政會四機構，以求無負於漸次進入法治與人民望治之至意；至於擔負決策與行政之責任，待之全國各黨一致協力於和平民主之日（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

傅斯年的呼聲

中國國民的憤怒，都為了政治無情的壓力，一切都潛藏著。我們在雜誌上，報紙上，似乎找尋不出苦悶的呼聲。這是整個地表現出人間暗黑的簾帷，太過深厚了；我們把眼睛打開，環視四周，看不見一絲的光明。至於人間正義的呼聲，我們更無從聽到了。這是今日中國政治黑暗的實在情景。

傅斯年先生在本月十四日的參政會席上，掀開政治暗幕的簾帷，作了一回驚人的獅吼，這值得我們全國苦悶的人民珍視的。傅先生爽直地指出，中國當前經濟財政的混亂，行政院長宋子文，應負其全責。並建議於政府，將宋子文與孔祥熙兩人的財產，予以查封。同時聲言，如果政府將孔宋兩人的財產充公，足以穩定民國三十六年全年的國民經濟。（上海字林西報二月十五日南京路透社專電）

傅氏乃中國當代有數的學者，他所說的，當然不是無的放矢，宋詠陷財雄勢大的孔宋兩位先生。况傅先生所說的，不是私人談話；而是在參政會席上說的，當然有所根據。我們相信，傅氏所陳，他必然完全負法律上與道德上的責任。傅氏又強調聲明，「余建議政府，立即執行有效辦法，以挽救目前危機，否則，余等即全體辭去參政員之職」。（十五日上海申報）

我們從傅氏的指陳與建議，可以看出這個有名學者情態如何昂憤，和埋藏他心中的苦悶如何深厚的了。

政府當局，聽到傅氏這種憤悶的陳訴，作何感想，又給傅氏以怎麼一個回答，我們在此不欲作如何的猜度。孔宋兩氏今後如何自處，我們在此也不願意浪費筆墨，多所陳述。

但，我們所欲說的，是中國整個面對着這種嚴重客觀事態，政府當局，絕不「裝作癡聵」，以為這是傅氏個人「書生之見」，無關大局，視作等閒。其實，傅氏所說的，雖是他個人的意見；也是可說為中國四萬萬五千人所欲說的話。即就政府官吏來說，亦有若干明智之士，抱上與傅氏同一的見解。陳立委願選對於調整外匯，曾作如是抨擊：「政府僅幫助不正常之資本家牟利。助長官僚資本。政府歷次調整外匯，皆有內在的原因。去歲

白禍重於黃禍

自從金潮鬧到極頂，一切物品漲價，都藉口金子，販夫走卒，也大談其金，那被拖由每石七萬元至十八萬元的米，這幾天一般人才感覺到頭痛了。現在黃金由八九百萬元，落到六七百萬元，可是米呢，今天（十六）仍佔在十四五萬元不動，我說白禍（米）重於黃禍（金），這問題恐怕比金子更難弄的。

黃金不過是一價值單位，通常各國多拿她做通貨發行準備，其實她既不能吃，又不能作其他生活使用，大多數老百姓和她沒多大關係。美國是金元國，她們爲了容易發展其資本主義，以金爲其手段，我們附庸的大國，自然也重金，拜金，如果中國人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可以金來換。可是我們忘了，我們不是產金國，更沒有本領（高度生產國貨外銷！）去換金。我們的財政家只有本領借，借終有限，一旦枯竭，馬上崩毀，黃金風潮是這樣來的。毀滅了金市場，也不要緊，只有那些有錢人，（官僚資本也好，豪門資本也好）的幸與不幸，而一般人都要吃的食糧——米，發生了問題，民以食爲天，這還了得嗎！

手忙脚亂的我們當路們，正在爲大家想辦法，他們也了解金子的風潮，不如食糧日用問題的嚴重性，於是要斷然措置：（一）公教人員即行

配給實物，（二）查抄米店，勒限出售存米，（三）又恐原價不能維持，一方查抄，一方放寬限價，每石十三萬元。上項辦法，縱然一切皆靈，

（一）公務人員佔上海市人口中多少？難道除了公務人員，其他市民都沒有生活權？其他市民中容有商人不少，水漲船高，不怕生活指數高，而商人之外，大多數人民，仍感威脅，怎麼辦呢？

（二）查抄米店，不是辦法，米的來源，才是問題。向例春荒米要漲，更況打仗以來，產地征兵征糧，更要鬧米荒。外來洋米，究有若干，有無資金大量採辦，運輸是否便利。米到上海，市當局究竟拋出若干，拋給何人收買，米貸款，生產貸款，我們都領教過了，誰敢保證不無國商作祟。（三）現市政當局，一方面要米店供售米糧，一方面又顧慮米商利益，真成了「忠孝不能兩全」的滑稽戲，結果老百姓今天須吃十三四萬元一石較上月貴一倍的米，還是千真萬確的事了。

我們沒有多大篇幅囉嗦，由於黃禍而來的白禍，真不得了，這白禍處理，恐怕比黃禍更費力。總之，在內戰不停，犧牲大多數人（豈僅大多數，除了幾門豪家以外的衆人）的現行經濟政策之下，「頭痛醫頭脚痛醫脚」枝枝節節的辦法，只是給大眾老百姓開玩笑而已。（銘）

中秋，因若干不正當商人，難以渡節。乃調整外匯，使其渡過節關。結果使金價十八萬漲至二十八萬。（申報二月十六日）衛立委挺生說得更爲明透，他「認爲黃金美鈔之高漲，等於宋氏一手造成」。（十六日上海大公報）

祇就陳衡兩氏所說，清楚地指出宋氏的不法行爲。其他國內外人士對於孔宋兩氏利用政治上的權威，以成就他們貪污的行爲的事實，更不勝列舉。

準是以談，傅氏的憤慨陳詞，祇不過是反映出國人對於孔宋兩氏的不平心境而已。我們現在假定，傅氏所說的話是對的，國人對他們的怨恨是有理由的，那麼，孔宋兩氏所應負的責任，似不應有所迴避，政府當局更不能顯前慮後，曲爲優容，以破壞國家官常，毀滅國家法紀。

我們今日放眼遠望中原，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間？人民不死於戰爭的屠殺，則死於貪官酷吏的枉殺。今更加上中央大員，自我造成金融經濟的空前大混亂，以經濟的利刀，來橫殺行將待斃的無辜國民。我們問，中國今日還成什麼樣一個國家呢！

故此，我們希望政府，對於傅氏所說的話，引爲忠言，採取一個有效的辦法，以肅官邪，而慰民望。並由此，或許使國民經濟，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也未可知。（采）

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果能生效嗎？

這次震盪全國的金潮，不能不認為經濟總崩潰的先聲！我們瞻望前途，真是不寒而慄。但是社會上似有一部分人，尤其是一般達官貴人，以及投機囤積者，對於經濟總崩潰並不感覺得可怕，甚且認為這是無稽之談。他們要綁萬貫，並不覺得生活水準受什麼影響。

他們看市場上的貨物與勞役仍照樣供給，各級各層的人們，依然在那裏活動；農人未嘗輟耕，工人依舊做工，商人照樣買賣。他們實看不出何以經濟會崩潰。他們在大衆的飢餓與死亡上面載歌載舞，他們並不覺得嗎？難道必須等到整個生產停頓，社會秩序紛亂到不可收拾的時候纔算是經濟總崩潰嗎？我們瞻望前途真是不寒而慄！

這一次金潮正是經濟總崩潰的前奏。短短十日之內（二月一日至十一日。十一日黃金達到九百五十萬最高峯。）金價由四百八十四萬漲至近千萬，物價隨之一日三漲，人心爲之惶惶不安。中央銀行本以拋售黃金，以抑平金價，穩定物價爲對策，到了此時竟然束手無策。於是中樞惶惑，遂有十六日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之宣布。

該方案之主要點有三：一爲平衡預算，二爲安定金融取縮投機，——禁止黃金買賣，以及外幣流通，並調整外匯，故長爲一萬二千元對一，同時取消出口補貼，進口附加辦法。三爲管制物價；——實施戰時物價管制

條例。

以上三項，我們認爲祇是治標的辦法，能否生效還是一個大大的疑問。我們始終認定，當前經濟的危機，通貨的膨脹是其總因，搶賊先搶王，此因不除，一切治標辦法，不免有治絲愈紛之感。

我們以爲政府未即宣佈緊急措施方案，金價與物價也會回跌下去。（其實，十一日以後金價已回跌）在理論上看金價與物價不會永遠上漲而休止。因爲金價與物價上漲到相當程度，過剩的通貨已被吸收，換言之，即過剩的通貨可能被上漲的金價與物價所抵消，所以非等到通貨再有過剩的積聚，漲風不致再起。據此，我們主張政府應走之路，必須根本穩定通貨，而後一切——不論黃金、外匯、物價——纔能根本得到安定。否則，法幣依然貶值，人民爲保有其財產，黃金的交易，不難由明入暗。至於外匯呢？在通貨不能穩定之情況下，真正開放外匯市場，任外匯找尋自然水準，不用說不能做；同時走私貿易未能消滅，外匯黑市，無從根絕，而物價必然受牽引而上漲。說到物價管制，我們根據已往的經驗與苦痛更不勝其疑慮。現在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我們所以希望政府在經濟總崩潰的前夕，做根本的打算，不要宣布了緊急措施方案就算了事。

（餘）

本刊啓事：本刊自去年三月底遷滬出版以來，迄今已共出四十七期，每逢星期六見世，從未脫期，此點堪

可告慰於讀者，爲求更能滿足讀者之要求起見，自下期起，增加編輯人員，儘量充實內容，革新編排，尙祈讀

者諸公本過去愛護本刊之精神，注意爲幸。再者，本刊雖爲中國民主社會黨之機關刊物，但亦爲民主主義者，

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之公共園地，如能賜以鴻文，當表歡迎，一經登載，稿費隨即奉上。

結束戰時財政

偉晨

財政是國家的一面鏡子，因此，從作為財政中心的預算不特可以看出國家的外形，還可以看出它的內臟。過去三十五個年度的國家預算很清楚的告訴我們民國以來的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而人民所過的生活是怎樣的。三十五個年頭已混和着人民的血和淚過去了，不幸的是三十六年度的預算帶給我們更深的失望和更悲慘的前景。

首先，三十六年度的預算已證明是過去的戰時財政的繼續。戰時財政是意味着人民生活的艱難和苦痛。八年的抗戰財政雖然帶給人民以無限的痛苦，但同時也為人民解除大和民族的壓迫。今日的戰時財政帶給我們什麼呢，除了飢餓和死亡之外？在舉世趨於安定，而中國全國人民要求和平的今日，我們獨站在經濟總崩潰的邊沿，依戀着戰時財政，忍令國家僅存的一點元氣也消失在彌天的砲火中。宣佈本年度的預算，不啻是宣佈中國人民的死刑。

其次，新預算給我們最顯著的印象是它的不平衡性。預算的不平衡有兩個意義：一方面是指預算表上數字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指預算執行後實際收支的不平衡。這兩方面的不平衡一向是我國戰時財政的特徵之一。遠的不必說，三十五年度預便便清楚的說明這點。那一年的收支在預算表是這樣的：支出為二萬五千億元，歲入為二萬零五百四十四億元，赤字預算算是五千億元。這是預算表上的不平衡。執行以後怎樣呢？據財政部俞部長的報告，一月至五月即去一萬五千億元（其中軍費約佔一萬億，約計百分之七十五）。下半年軍人待遇調整，支出當然大大的增加。實際的支出，據財政部長李儼在參政會上的報告，是超過預算上的支出一倍，即實際支出為五萬億。但據另方面的可靠估計，則為八萬億以上，這是說，實際的支出為預算表上支出的三倍多，收入方面，雖然租稅有溢額收入的現象，但增加的數字實微不足道。因此，收入祇有二萬餘億元，實際支出却將八萬餘億元，相差六萬餘億元，這是預算執行後的不平衡。

本年度預算不平衡的程度更嚴重了。根據官方的公佈，歲入是九萬三千二百億元，收入是七萬零三百三十三億元，僅就預算表來說，已有赤字

二萬二千九百餘億元。預算執行後，赤字當不祇此數。我們姑且用溫和的態度去看今年的物價，今年就和去歲一樣，實際支出比預算的支出增加三倍，那麼，預算表上的九萬三千二百餘億元的支出，到年底決算時便是二十七萬九千六百餘億元了，七萬餘億元的收入外，赤字是二十萬億元了。

收支不平衡本是戰時財政的通常現象，不過，我國是個經濟落後的國家，所以不平衡的現象顯得特別嚴重，而解救不平衡的辦法也顯得特別低能。生產的零後加上近年來變本加厲的經濟敗壞，便增加租稅的手段降低效用，而人民日甚一日的赤貧化也使公債的發行改變了原來的性質和價值，那裏剩下的便祇有執行了近十年的發鈔政策了。發鈔，這一含有最高度榨取性的戰時財政政策，是誘致物價瘋狂上漲從而破壞了生產進一步腐化了政治敗壞了社會道德使人民生活日趨艱難的始因。它，發鈔，在大部分的抗戰歲月裏，自勝利迄今的時間裏，和物價比賽着往前跑，做成了國家癱瘓，百姓飢餓的慘象。這一低能而惡毒的財政政策對收支的不平衡，不但毫無裨益，抑且將不平衡更推進一步，使預算執行後不平衡的程度加深。今年，我們將看見為了財政上的入不敷出而發行的二十萬億的新鈔，我們將親受物價再往上飛漲所加於身上的痛苦。

比平衡問題更重要的是財政的本質問題。財政的本質不但決定平衡問題，且決定財政的是否進步。從本年度的預算來探究，當前我國的財政可說有如次的幾個特質。這些特質都是繼承過去而來的，在某些方面，且有較前變本加厲的趨勢。

第一是封建的。所謂封建的特質是舊式的落後的特種的。第一個證明這種特質的事實是預算編製的不精確。本年度總預算尚未全部公佈，我們未能作詳細的檢討，但從參政會審議該項預算案的質詢，可見一斑。如左舜生氏說總預算編列極不完整，所列數字亦多不準確，例如公路總局僅列收入一千元而支出為二十五億元，各鐵路及郵電收入則完全未列。甘家驊氏說交通部及經濟部為國家龐大之國營事業機關，而該兩機關之預算數字均不清楚，儲匯局之項目竟未列入，資源委員會收支數目過於簡單，

支出數目為二千餘億，收入盈餘為三百億。事實擺在面前，連財政部的大長也不得不承認總預算編得不合理之處甚多了。預算的精確性是現代財政的特徵之一。新預算內凡有收入的部門收支都異常簡略含混，這充分的表現出封建的特質。第二個事實是審議的徒具形式。現代國家的預算係由行政機關編製而由代表人民的立法機關加以審議，殆無例外。我們的預算既交參政會討論，又提國防會議審議，最後由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形式做得十足；但我們在審議的程序中喚不出半絲近代的就是民主的氣息。第三個事實是在收入方面。現代財政的收入無不以能力主義為原則，使人民對國家的負擔比較公平，但我們卻一反此道而行。我們的財政收入最大宗是鈔票的發行，這必然的通過惡性的通貨膨脹而榨取特權階級以外的一切階層；換言之，即國家的開支主要的由貧窮的中下階層負擔。第二大宗的收入是田賦，田賦可分徵實徵借和帶徵三種。無論徵收的時候採取何種方式，也無論徵收所得如何分配於三級行政機構之間，總之，這也是使有很小納稅能力甚至沒有納稅能力的人負擔國家的支出；因大地主可通過舊式的租佃關係將田賦轉嫁給佃農，而中小地主和自耕農却因無法轉嫁不得不傾箱倒篋罄其所有去應付政府的無厭的錄求，而弄得家無隔宿之糧。第三大類的收入是關稅鹽稅和貨物稅營業稅等等的間接稅，間接稅必然轉嫁給消費者，但我們最大部分的消費者是貧困的。由此可知，我們國家的支出絕大部分是由貧窮的人民來負擔，還有什麼比這更有力的證明中國財政的落後性呢？此外，剩餘物資和救濟物資的出售也是收入的一種重要來源，用救濟災民的物資來救濟國庫，這是怎樣的一種財政，不問可知了。

第二種特質是殖民地的官僚的買辦的。預算中有兩項事實可為佐證。

第一種是對公營事業的補助，如公路總局支出為二十五億元，收入僅僅一千萬元，又如新資委員會收入為三百億元，支出却為二千億元，至其他官辦工廠如通商或擴充資本時在預算上都得到支持。又農民銀行應徵的官股紅利一億元，中國實業銀行和中國通商銀行各徵二千萬萬元，華福菸廠官股收入五十萬元，還有中央銀行買賣黃金所獲利潤不劃入國庫，這些都是積極的或消極的對官僚資本的培植愛護。另一種證據是出售剩餘物資和救濟物資。這一看便經手的官僚得到鉅大的買辦利潤，同時，使我們的工業的生存受到嚴重的威脅。

第三個特質是獨裁的。獨裁政治必然依賴軍事，必然要求鉅額的軍事預算。今年的軍事預算是三萬八千一百三十五億二千一百萬元，即佔國家歲出的百分之四十。儘管當局一再宣傳今年的軍事預算較去年（佔歲出的百分之六十）的減少三分之一，儘管宣傳這是近十年來我國財政史上的一大進步；然而，軍費佔歲出百分之四十依然是執行獨裁政治的戰時財政形態。何現百分之四十不過是預算上的表面的數字而已。隱藏在軍費之後的是「緊急撥支」這一項目。緊急撥支雖然可作任何其他緊急用途，但按過去實際情形來說，大部分是充當軍費的，如三十四年一月至八月，緊急撥支二千七百八十三億元，其中的一千九百二十七億便作為軍用。所以，軍費僅佔歲出的百分之四十這一着，不過是個把戲而已，其實國家大部分的收入是作為支持獨裁政治之用。此其一。

獨裁政治的另一種說法是一黨專政，所以在新預算中雖然被抹去黨費這一項目，但我們仍然發現不少為黨費而準備的漏洞。最大的漏洞是編製時故意做成的數字上的含糊與簡略，這尤其是指盈利事業的預算而言，在這種不精確或假造的預算中，包含着看不見的黨費。還有，在三千四百億元的教育政治內，據說就有一千多億是專作黨辦的各種文教機關的經費。一黨獨裁的政治做成財政上這種獨裁的本質，是很自然的事。此其二。

這三種特質決定了：（一）我國的財政政策和經濟政策完全脫了節，不但脫了節，而且對生產事業起着阻礙甚至破壞的作用，使國家經濟遲留在封建的殖民地的和官僚買辦的階段。（二）財政收入完全違反了公平的原則，即是說，大部分的收入取自社會的中下階層，而且需要的程度遠遠超過他們的負擔能力。（三）財政的支出是為了內戰，為了獨裁，為了特權階級的利益；這種支出不但是消極的違反了人民的利益，而且積極的威脅人民的生存。

中國今天的問題在生產落後，在物價任漲，在惡性通貨膨脹，在財政收支不平衡，在內戰，在獨裁。根本在生產在財政，決定在政治。為了國家的生存和我們自己的生存，我們必須呼籲兩事：第一，堅決的反對內戰以結束戰時財政。因戰爭產生了戰時財政，而戰時財政是當前的收支不平衡惡性通貨膨脹無止境的上漲經濟破壞社會混亂的基因。在目前戰時財政之下，不但國家建設無法進行，我們甚且無法生存。其次，堅決的要求民主政治的實行，以確保財政的民主化，使預算的編製審議和執行都能符合人民的利益。否則，我們唯有繼續在通貨膨脹間接稅和其他不合理的財政政策之下，負起國家全部的支出，成了特權階級的利益，而窮弱遊蕩死而後已。

尼赫魯和真納

George F. Jones
陳明譯著

兩個印度領袖的對照

印度一位聰明的政界人物，有一次討論印回分治的領袖真納，說印度有兩種領袖可以成功的：一種是好爭辯的人，專門在書面上辯論他的主張；另一種人就是尼赫魯。

這樣的分析，未免把尼赫魯和真納這兩個特別人物的對照看得太簡單。真納主張將印度造成印回分治，而且以宗教的情緒注射入他的主張裏去，尼赫魯則常以哲學的理論從理智方面解釋印度的統一。

最近時局的演進，已造成尼赫魯和真納兩人的地位，其行動足以影響一個人口衆多而且在世界的前途佔重要任務的國家。他們兩人雖然同是追求一位崇高的目標——自由的安定的印度，但他們求達這個目的的概念以及他們的為人，則絕不相同。

有幾次，由於政治的需要，使這兩個人相遇在一塊了；有時他們之間造成妥協，但結果仍是各行其道。尼赫魯有一次對我說：「我必須承認，我不了解真納。他所需要的是什麼呢？他願意贊同的是什麼呢？我每邊想斷定他對於這種問題那種問題的思想時，我總是得不到滿意的」。同樣的，真納也表示不滿意之狀，因他不能充分明白尼赫魯的極端複雜與微妙的心思。

這兩人的計劃是怎樣的呢？他們的人格是怎樣的呢？他們的領袖才能是怎樣的呢？什麼使他們不能合作呢？他們能態度一致而滿足印度的需

要嗎？先論他們的計劃。他們對於印度最重要的問題，是各走極端的。這個問題是造成統一獨立的國家呢？抑或造成印回分治（回教徒佔人口多數的省份名爲「巴基斯坦」，印度教徒佔人口多數的省份名爲「印度斯坦」）呢？除這個不同的主張外，當然還有其他更微妙的問題。

尼赫魯領導國民大會黨作國家主義的奮鬥，其主要趨向是循着反英路線；但真納所領導的回教聯盟（在印度政治舞臺最近數年出現的），其政治行動範圍，只限於保護回教徒，以抵抗印度教的多數民族。尼赫魯所企圖的，是促進印度各宗教成爲一個國家主義的集團，但他的成功到什么程度，觀察家可自加判斷。然而真納和回教聯盟則着重於宗族的鬥爭。尼赫魯的政治傾向，似乎稍爲偏左；惟真納則贊成造成一個隨時可動搖的中等階級社會政治機構，而實行他的「巴基斯坦」。

至於他們的為人，則又全不相同。尼赫魯今年五十八歲了（按一九四七年計），他做事確實行動機敏，態度溫文，除了在國外旅行外，他常穿印度式的衣服，而且戴着呢帽，遮掩禿頭。真納的年齡比尼赫魯老十三歲，個子很瘦削，面形瘦削，態度緊張，個性倔強。他對西洋文化雖並不很熟識，但他的西裝修飾得很整齊很雅潔，只有向職業演說時才穿起印度長袍。

他們兩人的背景，除了宗教方面外，並沒有很大的不相同。尼赫魯生於克什米爾亞羅門教的貴族家庭，他受到尊貴和能幹的遺傳，致使他在印度的政界能早得飛黃騰達。真納的家庭是個有錢的商人家庭，在其他方面並沒有什麼特別出色。他們兩人皆去英國留學，尼赫魯肄業於英國著名貴族中學——哈羅中學及劍橋大學，吸收過英感的快樂；真納則在倫敦的著名法律大學林肯法店（英國研究法律的大學稱爲法店）讀書，人家給他起了一個「穿黃長袍高而瘦的孩子」的綽號。他們兩人入仕途，都因國民大會黨爲進身之階，但以後真納則離國民大會黨，呼籲印度的回教徒集合於「彎月及一粒星」的旗下。

他們的方法很不相同。尼赫魯從來不組織維護他個人的喋喋，他的呼籲之所以感動人，是由於下列各種因素：人家仰慕他的理智，尊重他的國際聲譽，敬愛他的富有感覺以及合乎人情的衝動，又因他不倦的旅行全國，廣泛的與人接觸，容易得人家的回應。但真納和他完全相反，真納喋喋必要有個人關係，而且要熱狂的效忠他。他幾乎要求印度將達一百萬的回教徒服從他的呼聲。

尼赫魯在印度混亂政治狀況中的地位，正如其爲人一樣，很不易加以肯定。他並不是外國人所以爲的印度國家主義運動的領袖，更不是國民大會黨最高的發言人，因這個領袖及最高發言人當然是聖雄甘地。但尼赫魯却是印度國家主義運動中理智方面的發言人，即是國民大會黨對西洋國家方面的發言人。他並非國民大會黨中擁有權力的政治人物，而這個國民大會黨中最高權力的政治人物却是個強而過不安分的巴特爾（Sardar Vallabhbhai Patel）。尼赫魯不管政治的例行工作。

（本文下刊第十六面）

勞工參政問題

Jack Kroll作
靜觀譯

前次羅斯福總統四度當選，打破美國憲政史上的成例，論者多歸功於 Cio Pac。那末，所謂 Cio Pac 到底是個什麼組織？它究竟有些什麼魔力，能影響美國政治如是大？它的主要組成員是那些人？它的宗旨是什麼？它的主要活動為何？它最近又有些什麼政治主張？這些都是關心美國政治的人所不可不知的問題，本文即可給予我們以一個簡明扼要的解答。

原文載「紐約時報雜誌」，為 Jack Kroll 氏所作。氏為 Cio Pac 主要領導人之一，宜其對於該會情形，編述來，如數家珍。全文原為對哥倫比亞大學 Henry Steele Commager 教授於前一週在周一刊物上所發表的一篇論文的答辯，但其對於 Cio Pac 的組織要旨，確已闡發無遺了。這不是為我們了解彼邦現實政治的一助，且可供我們談民主政治的人的借鏡。爰亟譯之，以餉國人。

譯者識。

勞工何以要參加政治？答案很簡單：勞工所以要參政，係與其向常參加政治的理由相同。美國自有勞工組織以來，勞工領導人在政治與經濟方面，即都已有了組織。大家知道組織勞工的權利，乃是一種立法事件，而非一任勞資雙方自行協商的事件。兒童勞工法，工作時間與環境，工人的報酬以及一切有關工人的事宜，其為立法問題，一如其為勞資關係的問題。

在勞工組織的初期，工會主義本身，便被一般國會議員們視為一種陰謀，立法禁止其存在，這班議員們，無論從任何方面看來，都是反映資本家的意見的。因此之故，工人們自從開始組織以來，即感到在國家及聯邦的政治與立法上活動的重要。

法律係由議員通過成立的，所以勞工自始便認識必須參加國家的選舉，並以聯邦國會議員不懂須對勞工表同情，且也須顧到人民一切其他的需要，工人們住在家裏，他們與其家屬，都極關心社會的福利。健康設備，學校制度，運輸問題以及一切其他屬於立法控制的社會問題，自然都要受政治行動的影響。為了這個理由，故政治行動早就被勞工領袖們視作工

會貨幣的正面，有了正面而無反面，那是毫無意義的。

可是自從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 Cio Pac 成立以來，其所引起的反對勞工參政呼聲之高，我們在過去卻從未聽到這樣的聾耳欲聾。

這倒是真的，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對於勞工參政，確曾加了一點新玩意進去。最先，產業組織大會的領袖，便感到勞工總不能長此被人當作少數看待，並以遺少數人的利益，係與其他集團的利益相衝突。反之，它却很明顯地與其他經濟政治利益相同的集團打成一片。因此，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自始便以為勞工的政治組織，必須在工人居處附近活動，而不應祇限在工會會所裏面。依照普通政治組織的路線，它便開始在各政治選區裏面組織起來了。

在政治活動方向，產業組織大會對於本會會員與其他有組織或無組織的團體的會員之間，都是一視同仁，無分軒輊。因為它承認它所要求的保障與它所主張的生活水準的改善，並不單為其自己的會員請命，同時也為所有一切自食其力的人民請命。今日必須為生活而工作的人數，總有五千八百萬之譜。這些人民與其家屬，在美國並非少數。事實上他們就是大眾。

有人以工人為次等公民，其在政治組織與行動上的權利，無論如何都要比任何其他集團的權利為少，這話不管來自何方，其所含的意義，產業組織大會是決不承認的。勞工在政治上組織的權利既一經被人承認了，則勞工想在我們政界上擔任一種重要角色的要求，便不能提出任何基本的反對理由，尤其鑒於產業組織大會最初便主張它在政治上所作的要求，首須考驗其是否對全體人民有利，即更不能如此。這並不是一句說說罷了的空話。

現在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立已約三年了，且曾參與了兩次政治大選。如果有人對該會感到興趣者，隨時都可得到政治行動委員會活動的全部紀錄，以及其自始所採用的政綱。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

曾經發表并廣事分發了其一九四四年的政綱，比較最近的，則有「一九四六年的人民綱領」。這些綱領是任何公民都可索閱的。

勞工在這些綱領裏頭到底作些什麼要求，即輕輕的解釋起來，也可說是對州議會或國會在贊助一種少數集團上具有無限的影響呢？在一九四四年，我們會要求一種內政政策，使我們能够實現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四年一月致國會的咨文中所提出的新人權宣言。其所建議的明細辦法如下：一、和平世界的充分就業的計畫；二、聰明而協調的復員計畫；三、一種與整個社會計畫相配合的大規模造屋計畫；四、保護農民；五、保護小商人使不受獨佔事業的侵害；六、履行我們對服兵役的男女所盡盡的義務；七、改善我們的社會安全制度；八、保護並改善我們的教育制度；九、保護少數集團；十、擴張公民權，使全體人民皆可享有。

我們的政綱並不單獨涉及內政問題。當時我們知道如同我們現在知道的一樣，一個國家的內政政策，總不能離開其外交政策而閉門造車。所以我們在當時，即極力主張在「完全消滅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日本帝國主義以及他們的禍害」之後，必須繼以某種辦法，使聯合國的政府與人民，彼此可以友誼日增而合作益切。達到這些目的的計畫的完成，在我們的政綱裏面都有明白的闡述。

如果第七十九屆國會對我們一九四四年的政綱所建議的各點下過注意的話，則我們一九四六年的問題，便決不致如此的黯淡與險惡了。

在一九四六年，我們的政綱含有十四項要求，那就是：一、對生活費用的增高作有效的控制；二、計畫為大眾造好房子住；三、制定 *Wagner-Murray-Diell* 的保健法案；四、一律平等的良好教育；五、給退伍軍人以良好機會；六、使一切少數集團有無恐懼的自由；七、通過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五的最低工資法；八、通過有效的禁用私刑法；九、廢除人頭稅；十、通過成立一種永久性的公正僱傭關係委員會 *FEPC*；十一、保障農民的利益；十二、保護小商人；十三、一種真正民主的賦稅制度；十四、一種能使我們獲得永久和平的外交政策。

我們把它叫做「一九四六年的人民綱領」。沒有一位公正無私的人，會把它視作一種有限權力集團的政綱。這並不是一種政綱，使勞工們藉以求犧牲任何其集團，以換取自己集團的利益。

哥倫比亞大學的康茂傑教授 (Prof. Cummings)，於其前週在「紐約時報雜誌」上所發表的論文裏面，曾提出一種很有趣的議論，以為在勞工政綱裏面，「如不公然是」，便隱約存有一種「美國政制完整的威脅」。康茂傑教授固深知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從其開端以至現在，都不是一種第三黨運動。何況在我們的政治史上，我到處找不出一點兩黨制即美國政制的迹象。今日我們有十三個州，其中便祇有一個有力的政黨；如同我們過去所有的一樣，我們現在也有許多第三黨與第四黨，都在我們憲政體制範圍裏面組織起來。

康茂傑教授斷言，「目前勞工的政策，暫時固傾向於促進進步的立法以及勞工利益的一種比較健全的代表，但久而久之，便會使我們的政黨與政制趨於分崩離析了。」康茂傑教授雖承認目前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政策，係傾向於促進進步的立法——這確是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目標——可是他却並沒有說出他的恐懼的理由。他的恐懼分明是毫無根據的。

政治行動委員會曾經將其政綱提供兩大政黨參考。它籲請它們改弦更張，并在其考慮出任公職候選人之際，應以全民福利為先。凡我們向雙方有所進言者，與其說是使我們政黨政制分崩離析，毋寧說是加強它們。康茂傑教授乃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史家，他應該知道假使我們的政治制度真會發生分崩離析的話，那一定是由於兩大政黨內部的腐敗與弱點使然，而非由於兩大政黨之外的任何集團，有什麼爭權奪利所致。

我猶有不能已於言者，我們的政黨與政治制度，其本身並不站在我們人民的福利之外。我們的政黨與政制，係為人民而存在，並非人民為政黨而存在。我們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係獻身於保護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並為全民的生活水準不斷改善而奮鬥。不過，假使這樣的一種政治競爭，結果竟使我們的政黨制度產生新的行列或起了什麼變化，那却不能嚇住我們。

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對於兩黨候選人，如其進步行動的成績紀錄與我們的目標相符合時，殆無不加以擁護。我們並不是出來摧毀兩黨制的。我們也並不是出來奪取任何一黨的。我們的鬥爭，就是要以我們的行動，使兩黨的完整和「得所改善。假使我們發現某某一黨太冥頑

不靈，過於貪污，且過於屈身以事資本家及「垣街」，則我們當然祇有與其他一黨，作更充分的合作。

我完全同意康茂傑教授這句話，當權的政黨，應不「祇是代表某某一人，代表某某一集團，代表某某一派，代表某某一種利益。」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所致力，正就是那個目標。在我們的紀錄中，殆無一事不足以表明我們從開始起，即為那個目標要求與工作。我們的格言是：人民的利益，就是勞工的利益，勞工的利益，也就是人民的利益。我們從未放棄這個信念。這在我們自從組織成立以來所從事的一切行動上，都已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我們對於小農民的需要，正與我們會對一般工廠工人一樣的加以注意；同時我們曾再三要求保障并扶植小商人，也同我們要求改善白領工人的命運一樣。

因為我們確實知道，要末除非人民小心國防，要末除非有組織的勞工起來領導他們警覺弗懈，其中一黨或兩黨，是會變成有限資本家集團的代表，是同過去它們所會變成的一樣。

我可以確實斷言，政治行動委員會是對美國有利。同時我也深信不疑，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假使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業已存在，且曾開始活動的話，則我們或不致發生可怕的經濟蕭條，并可意料得到那定可以影響我們的外交政策，使其在法西斯主義尚未變成這樣的殘暴和強盛以前即已擊敗之，因之或可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得以避免。

現在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已經站住了。我希望它將有助於避免另一次經濟蕭條和另一次世界大戰。

不僅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業已站住，直至共同目標達到為止，而且我還可以在此預言，在其未來活動上，將有一種新成份加入，這對於某種反動力量，一定感到不快，并且將受到它們的攻擊，一如其在一九四三年初成立時的情形一樣。

在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未組成以前，美國的勞工，原是依着高談勃（Gompers）派的舊路綫，於事後獎賞勞工之友而懲罰其敵。至產業組織大會成立後，才決心參與人民之友的選舉，因之才賞給人民以優良的國會，於是才用不着事後的懲罰了。

但是我們現在所推行的政黨制度，却頗使人民左右為難：我們在預選時原有選舉權，所以使我們公民，有權決定選擇人民的候選人，唯這種權利却從未行使。我們發現職業政客與委員們，能够操縱候選人的選舉，還班候選人，不是資格能力不相稱，便是委身以事某種集團以換取它們的歡心。其結果便是教我們在投票處所，祇有在半斤八兩中間去選擇。我們所能做的，唯有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

我們必須要使一般人民認識清楚的，便是其害較輕者，仍還不失其為害，我們必須要設法在善惡利害中間去抉擇一種。這一點我們是可以做的，假使我們能够喚醒一般人民，都來參加預選，甚至在舉行預選以前，都來參與各地委員會的活動，恰像我們於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喚醒他們去登記與投票一樣。這便是我們在兩年裏邊在美國各選區中所應做的工

作。我們也承認，這是一種對我們政治制度的挑戰。這是對政治上的冷漠與無知的挑戰。所以我們要聯合美國所有進步的力量——農民，消費者，小商人，職業團體與公民團體——共來驅除這種無知，并把一般人民從冷漠中喚醒起來。

同所有一切在這個良好公民的大問題上願意追隨我們的有組織與無組織的工人們通力合作，并聯合一切進步份子共同反對反動及經濟蕭條的危險，勞工將以次兩年的時間，專從事於教育人民，使其能在預選中負起他們的責任。我們將任意使用所有的武器，并儘量使用我們所能增加的新武器，以說服美國人民，使其相信我們的民主政體，祇有所有人民都能了解國內與國外的基本問題，才能維持其民主，并且祇有他們具有人民的意志不可出賣的明訓，以選擇他們在州議會及國會中的代表，那才能維持民主於不敵。

勞工的政治上的任務是一種挑戰，但這種挑戰，我們善良的教授們却是不用着煩惱的。勞工的政治上的任務是一種挑戰，其意思是說假使我們的生活方式是求生存及前進，則我們人民，便必須手攜手地共同起來，阻止公職上的反動，并將腐敗與私人所投的利益，從我們國家及聯邦資本上排斥出去。

蘇中解放區及其他

一．前言

祇要我們細心的翻翻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羣衆三日刊……這類的中共刊物，關於解放區的報導，幾乎千篇一律地，把它描繪成爲美麗的樂園，和人間的天堂一樣，要想發現它的缺陷——那怕是一些微的缺陷，也困難之至。

和這個報導完全相反，流亡於京滬和江南一帶的幾十萬難民，在他們的眼中，解放區已經成爲恐怖和災禍的代名詞了，一經提及，無不咬牙切齒，恨入骨髓，甚至幾歲的小孩，也有「倍亡」之痛。

人們對於同一事物的看法和評價，竟然距離得如此的遙遠，這是一件頗爲遺憾而且值得研究的事。

「入主出奴」，人自難免，再加之各自帶上了有色的眼鏡，來觀察事物，分析問題，因此，一方面，在客觀上就黑白不清，涇渭不分，另一方面，主觀上又在有意的顛倒是非，歪曲現實，這就自然而然的會走上兩個極端了。

我登在解放區的日子很久——久得從它的萌芽時期，到它的發展的飽和點，也掛過「參議」，「參政員」，「顧問」這類的空銜，我自信較之斯諾，羅波爾，斯沃特萊……這些外國記者眼中的解放區，認識得較爲清楚和深入，我也力求做一個忠於事實忠於良心的客觀報導，雖然絕客

還俗

觀的事情，世界上總是沒有的。

但我得首先聲明的，第一，我的報導地區，主要的是蘇中解放區，包括濱江的南通，如皋，海門，啓東，靖江，泰興，寶應，江都，揚中九個縣，和與之昆連的高郵，寶應，興化，東台四個縣，再加上中共爲了統治的便利，所增設的如西，柴石，台北三個縣，總計爲十六個縣份，就是現在的中共蘇皖邊區第一分區的轄區。其他的解放區，類多走馬看花，難以深入內層，但中共是一個組織嚴密號令統一的政黨，由此也可以窺見一斑，總不致有着太大的出入的。第二，我的報導內容，在時間上也祇限於兩次大夾擊之間的六個年頭。所謂兩次大夾擊，第一次是一九四〇年的秋天，新四軍陳毅部渡江北上，八路軍黃克誠部越路南下，夾韓德勤、李守維部於黃橋曹

甸兩地。第二次是一九四六年的秋天，徐州綏署薛岳部越路南下，第一綏靖區李默庵部渡江北上，夾擊張鼎丞粟裕部於淮陰如皋兩地。投桃報李，一往一來，中間恰恰是六個年頭，也就是蘇中解放區從萌芽到衰枯的整個時期。第三，臨到「解題」了，所謂「及其他」者，對於其他解放區的可靠材料，和我個人認爲比較成熟的意見，也願意全部的提出來一談，純爲放大範圍行文便利故也。

二．解放區的建立

對於頑覆現
存政府，建立
自己的政權，這是一貫的黨策，也是本之於
列寧的遺教：「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
馬列主義的中國啓蒙大師，中國共產黨的創造
人陳獨秀，終以「右傾機會主義」、「半托洛斯基
派」的罪名，被無情的開除出去，其中的重要因
素之一，實在由於陳獨秀在北伐期間，沒有決心
以暴力建立政權的原故。

中共在以後十年所領導的蘇維埃運動，一無
所成，這給予他一個最深最大的教訓，無論從敵
我力量的對比上，國內國外形勢的變化上，和全
國人民包括工農階級的同情上，如果這樣子繼續
下去，也終將一無所成。因此不得不改弦更張，
另謀出路。基於這一因素，產生了抗戰之前的八
一宣言，抗戰之後的共赴國難宣言，以及對西安
事變所採取的和平解決方針。但這是一種方式的
轉換，而奪取政權的終極目的，并未作絲毫的變
更。

抗戰爆發，國民黨面對着強橫無比的敵人，
應付得手忙腳亂，焦頭爛額，自難分力以對內，
而在主觀上，也鬆懈了對中共應有的警惕。這個
時機，該是中共建黨以來，奪取政權的最好時機
了。用恩格斯的語來說：「動盪的劇變的時期的
幾個月，要抵得上甚至超過平常時期的幾十年
」。

以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以後更名為抗
日民主根據地，今名解放區)爲其掩護，中共開
始行動了。

建立解放區的方式

大體上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方式，這

個地區本有中共的祕密組織，及潛存的武裝力量，抗日戰前，乘機而起，再配以外來的軍事力量，逐步的兼併驅除了異已勢力，樹立起自己的政權，譬如山東，原有中共山東省委姜玉等所領導的武裝，即所謂「土八路」，據有地盤，雄峙一方，後來「老八路」進入山東，自更軍勢大振，所向難敵了，這是一個範例。

第二種方式，這個地區，黨的組織，不夠強大，武裝力量也不足以排除異己，主要的倚靠於外力的應援，以奠定全局。為我所要介紹的蘇中解放區，便是一個範例。

當然，無論「內力」「外力」，都是秉承着延安中央政治局的命令，步調一致，動作協同的，祇有為主為輔的區別，並無各自為政的毛病。

建立解放區所運用的策略

就其聲勢大者言之，可

分為三：

(一)向「邊區」「三角地區」進軍——所謂「邊區」「三角地區」，總在兩省或兩省以上的邊緣地帶，因此，中共獲得了三個有利條件：

第一，政府鞭長莫及，控制力量比較薄弱。人民對於政府的「向心力」較小，「離心力」較大。而且，地方類多貧瘠，民性強悍，富有冒險犯難的精神。

第二，既非政治樞紐，繁華中心，因此可以減低對方的注視力和重要性，又不是日寇必得的戰略地帶。

第三，雖然是「你也會，我也會，大家來管

」的地方，而實際上往往流為「你不管，我不管，大家不管」的現象。

(二)向多種領導勢力的地區進軍——既係多種領導勢力，在對方就難免有事情不一，甚至意見分歧的毛病，而在自己方面，又可遂行一打一打各個擊破的策略。我們先就山東而言，抗戰初期，政府方面，有兩種領導勢力的存在，一為中央系統的山東省政府，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部（沈鴻烈），一為東北系統的魯蘇戰區總司令部（于學忠）。中共利用西安事變與東北系所建立的良好關係，盡量對於學忠軟弱拉攏，並以郭維城（魯蘇戰區黨政委員會委員）為首，充當內線，挑撥于、沈關係，終使于、沈雙方惡化，中共得以全力對沈。沈既跨台，遁回重慶，于學忠自亦不能倖免，終被打得不留一兵一卒，光桿子跑掉了。

至於蘇北，更是一個顯明的恰當的例子了：在政府方面，當時有這樣的三種領導勢力：最大的要算韓德勤、李守維了，韓任省府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李任保安處長兼八十九軍軍長，所轄部隊有八十九軍（二師四旅八團），獨立第六旅（三團），保安總團（十旅二十團），連同指揮下的游擊部隊及各縣常備旅團，總計不下五萬人。其次要算李明揚、李長江了，二李任魯蘇皖邊游擊正副總指揮，轄十個縱隊（三十個支隊），約二萬人。最後要數到陳泰運了，陳任財政部稅警總團長，人槍雖不足萬，但以素質較高，配備較好，也自成一個領導系統。

三方面的關係是這樣的：韓德勤李守維是復興社員，當然是中央系統。陳泰運也是復興社員，同是中央系統。但陳個人恃才傲物，不受韓李指揮，雙方頗為不睦。二李係各地揭竿而起的游擊部隊改編而成的，與韓李關係惡化，與陳泰運有聯繫而不密切。

在中共方面，黨的組織，南有蘇北特委，北有蘇北區黨委，黨員均少得可憐，大部份的縣份還是未開鑿的處女地。武裝部隊，有地方祕密黨員發動組織起來的挺進縱隊（司令管文蔚、葉飛），人槍不足三千，局處於江都泰縣之一隅，根本不足以成大事。

這是當時的國共雙方的態勢。

中共圖謀蘇北，蓄志已久，因為：第一，華中新四軍和華北八路軍會師蘇北，打成一片。第二，農產豐裕，經濟流暢。第三，南可拱衛江南，北可屏障山東。而且，第四，蘇北已成孤島，加之系統複雜，自相矛盾，沒有勁敵，取之不用大力。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新四軍陳毅部渡江犯蘇。首先向省保安指揮官兼游擊指揮官何克謙開刀，而對其他的保安部隊和游擊部隊，則採取友好合作的偽善態度。這是中共英明的一着，因為何雖隸屬韓李（明陽），而實際上是誰也不隸屬的土皇帝。陳毅既可據有沿江的如泰、泰、靖地區，使自己的腳跟站穩，作為大踏步北上的跳板，又不致打痛韓李（明陽）的要害，以減輕他們的仇視程度。同時，一面對李（明陽長江）陳信使往返不絕，牆上貼的「擁護」的標語，會上喊的「萬歲」的口號，甚至陳毅也兩次的向李陳移樽就教，許顯心，發誓言，極盡卑躬屈節挑撥離間之能事，待至九月後黃橋大戰，一陳二李，或

按兵不動，或暗通聲氣，果然被「拉」住了。陳毅所部，得以全力對韓，韓德動輒斃失，李守維落水而死，果然也被「打」中了。這樣的「一打」一「拉」，就初步的完成了蘇北解放區的基礎。直至一九四四年的冬天，中共又由對李、陳的寬宥政策，進而為最後的鯨吞了，終將李陳消滅殆盡，奠定了蘇北的全局。

(三)向中日戰局緊張的地區進軍——每當敵寇大舉進犯，政府陷於戰局紊亂或軍事挫敗的時候，中共也就跟着全力推進了。這是名利雙收的策略：

第一，有理。所謂有理，可從三方面言之，一方面可以宣稱在援救友軍，支持友軍，以表現中共的和衷濟艱全大局的精神。二方面可以宣稱在收復國民黨失去的土地，以表現中共的抗敵有功，和國民黨的守土不力。三方面又可於既得之後，振振有詞：「我取之於日，非取之於國」。以混淆各方視聽，爭取優勢輿論。

第二，不用說得，取之不必費力。因為政府應付日寇之不暇，那有餘力顧到中共，中共自然處於進取的主動的地位，而政府則完全與之相反。譬如一九四一年馮恩伯部中條山之戰，一九四三年韓德動部曹甸之戰，中共均乘機推進，消滅了重圍之後的老虎，建立了或擴大了解放區域。中共中委蘇北軍區司令黃克誠，曾以幽默的口吻說：「中央軍跑到那里，鬼子軍追到那里，鬼子軍追到那里，我們也就跟到那里。」就是這一策略的妙用。

一致。

當年列甫與馬爾托夫曾經發生過這樣的爭執，馬爾托夫主張一切同情於共產主義的，協助共產黨工作的份子，均可入黨。列甫則堅決的採取相反的意見，認為黨員應該成為黨的組織之一員，為黨工作，受黨支配，反對把黨的組織沉淪於自由主義的大海里。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在列甫和第三國際的領導之下，因此，他的組織嚴密，黨紀森嚴，並沒有鬆懈煥散的毛病。加之長期的處於鬥爭狀態之下，唯恐敵黨破壞，更加强了黨的秘密性和嚴肅性，一向有「铁的組織铁的紀律」之譽。所以中共對於奪取政權建立根據地的任何方針，計劃，策略，步驟和方式等，祇要在延安的通盤籌劃之下，各個戰略單位，均能服從命令，統一步調，協同進行。如山東的內外齊發，蘇北的南北夾擊，他如山西的新軍之變，和新四軍八路軍的長蛇相接，絕無此起彼伏你進我退的脫節現象。至於同一地區的黨政軍關係，更是合作無間，各盡其職。又由於上述的組織嚴密，黨紀森嚴，所以任何的機要的決策，也不致暴露，而在他的對手方面，差不多都被蒙在鼓里，糊里糊塗，任憑中共巧妙的「拉」媽來「打」出去，全處於被動地位。

第二，善於運用策略
中共的「一打一拉」，「一拉一打」的策略，真是妙用無窮，與他默契或者合作過的黨派，集團，或是個人，在這一策略的運用之下，老實點的被消滅殆盡，聰明點的也大吃其虧，但在中共自己，確是有大大的成功的一面。中共在對策略的具體運用上，又能掌握四大要點：

甲，通過內綫，深入的精密的調查研究，可謂「知彼」。
乙，「打」能打在痛處，「拉」又拉著癢處。
丙，「打」能服從「有理，有利，有節」的三個原則，「拉」能掌握「小處慷慨，大處着眼」的整個精神。

跡了，在運用的過程中，絕對嚴守機密，不遺痕跡。
抗戰以後，國民黨中有政治頭腦的唯程之才，都已內調，而全部代之以軍事將領，這班人一生戎馬，固然胸有「軍略」，但沒有「策略」，更沒有懂得中國共產黨的實質，所以如于學忠，沈鴻烈，鹿鍾麟，韓德動，李明陽，穆徵流，張蔭梧……之流，垮得是那樣的慘那樣的快。而中共派赴各地之領導大員，如劉少奇，饒樹石，陳毅，蕭華，鄭位三之輩，類多足智善謀，長於政治。僅知「軍略」的軍事將領，并不能主持大計，領導全盤，僅作為他們計劃下的新將軍隊的指揮官而已。

第三，善於煽動羣衆，運用羣衆
中共深知羣衆力量的偉大，操之則存，失之則亡。所以共軍每到一地，則以抗日民主口號，號召熱血青年，減租減息口號，號召貧苦農民，提高工資口號，號召城鄉工人，婚姻自由和財產繼承口號，號召被壓迫的婦女，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口號，號召知識份子，發展資本主義，保護私有財產和保障交租交息口號，穩定小有產者，商人，資本家和地主富農的情緒，減輕人民負擔，取消苛捐雜

建立解放區成功的因素

第一，組織嚴密，步調

稅和打倒貪污份子，迎合各階層人民的要求，更公開的承認，內戰時代殺人放火行為的絕對錯誤。但應由李立三個人的政治路線負責，以掩蓋過去的劣跡醜史。在方式上，又以話劇，活報，露天戲，文明戲，娛樂會，聯歡會，音樂會，座談會……來接近羣衆，以工抗，農抗，青抗，學抗，教抗，婦抗，兒童團……來組織不同的羣衆，結果，大批青年擁入，同情份子更多。

第四，客觀上存在着有利的條件：

甲，國民黨於北伐勝利以後，變成官僚機構，忽視羣衆運動，尤其沒有懂得掌握住決定中國政局命運的青年羣衆和農民羣衆。以二五減租為例，本屬輕而易舉的事情，國民黨一擱竟達十餘年之久，直到共產黨在自己的區域內推行起來，獲得了農民的擁護以後，才慢慢的更慢慢的做起來。

乙，國民黨執政十餘年，堅持專政方針，毫無民主誠意，排除異己，捷發異黨，「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不特是中間份子，甚至連許多本來反共的人士，也跑到共產黨那邊去了。

丙，國民黨的基層政權，全爲封建份子，貪污份子，腐化份子所操縱掌握，吏治之壞，亘古少有，引起了廣大人民的不滿，尤爲受害最深的農民羣衆，和富於正義感敏感性的青年羣衆所憤激反對，一經中共的煽動和組織，迅速地匯成了一支反對國民黨的洪流。

丁，國民黨會經流行過「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口號，「黨外無黨」，國民黨實質化了很大的力量，武裝的共產黨不談，即便是白面書生名流學者所組織的青年黨，國社黨，第三黨等，

也會受其壓迫摧殘。至於「黨內無派」，純爲欺人之談，而且愈來愈加談不上了。以至國民黨的黨政軍之間，黨政軍自身之間，上下級之間，不特不能團結合作，和衷共濟，而且意見分歧，門戶特深，大大的予中共以可乘之機。

戊，最後，還有一個起着決定作用的客觀因素：日本法西斯強盜吞中國共產黨扼住了義務的清道夫。

人事雜定黑白棋

中共對於蘇中蘇北，特別是他們眼中的所謂「華中烏克蘭」的蘇中，圖謀已久，志在必得，我於上文已詳爲述及。但新四軍成立方三年，擴展的地區太大，兵力自不敷分配，雖然陳毅將江南指揮部所屬精銳，抽調一空，而隨同渡江的也僅有第二縱隊的四個團，再加上原在江

蘇泰縣邊區挺進縱隊三個團，和新自李明陽部調變過去的一個支隊（支隊長陳玉生），總數不足三萬。八路軍自山東南下的第五支隊（司令黃克誠），又遭受到國軍堅強的阻擊，以致推進遲緩，長期的滯留於兩淮以北，南北相隔遙遠，無從策應。所以僅以陳毅的兵力，要想解決蘇北問題，特別是實力派中的巨魁韓德勤李守維系統，自然是力不從心，事與願違。

中共當時便採取了「拖」的方針，而以「停止內戰，合作抗戰」的口號，爲其烟幕，派代表，分頭活動。並利用廣大人民的渴求和平恐懼戰爭的心理，組織和戰代表團，進行呼籲，以遂其「拖」的私願。

中共這一方針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因爲：第一，期待八路軍南下，俾可南北夾擊。第二

，渡江部隊，經過長途跋涉，又經過與何克謙部及地方駐軍的戰鬥，須要休息整理。第三，肅清敗軍殘部，鞏固既得的沿江地區。第四，爭取餘裕的時間，挑撥三方面的關係，並試探二李一陳的真實動向。第五，博得不打內戰專心抗戰的好評和同情，包括韓、李、陳三方面的部屬在內。在以後蘇北事件的發展中，完全證明了這一方針，是獲得巨大的成功的。

這中間還有一段事實：

蘇北香帥韓紫石，北伐以前，兩任省長，導淮督辦等要職，門生故舊，遍佈東南，時雖年邁，息隱園林，但對於地方政事，仍具有潛存的左右勢力。和李明陽的關係，尤較密切。中共深知這是最好的對象，用盡心機，化盡手腕，加以獵取利用。遠在上年春間，陳毅就邀請蘇南士紳陸小波介紹，與之書信來往，陳毅東進蘇北以後，更躬親拜謁，禮物饋贈，金錢致送。並且滿嘴的和平合作，一口的敬老尊賢，作爲進一步的獻媚拉攏，以博取韓紫石的從中相助。所以當時韓紫石的態度，雖然對於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內戰，都表示厭惡和反對，而對於新四軍的渡江進攻友軍部隊，淮佔友軍防區，則主張省方應該容忍退讓，維持既存事實。這一點對中共是大大有利的——完全吻合了「拖」的方針。以後的黃橋決戰，李明陽、陳泰運又按兵不動，置身事外，韓紫石在內中也起了絕大的作用。

迄至九十月間，在時間上已拖了兩三個月，新四軍各項準備工作，初步完成，八路軍也兼程推進，攻入兩淮以南，也就是說：「拖」的目的已經初步達到。（待續）

還鄉觀感 (續完) 龍子

(三) 鄉人的痛聲

在風雨泥濘中行了五華里，到了自己的本鎮，這是江陰西鄉的首鎮，戰前周圍三四十里遠近的鄉民，都到這裏來做買賣，市面極其繁盛，店舖大都成為小本經營的攤販，已沒有一升股實整齊的店舖了，房屋毀了些，但表面看來也還差強人意，內容的實質是一落千丈，大有今昔之感了！

鄉下做客，第一是吃。我雖不是客，但離家太久，鄉人也當我客待了！到鎮半小時，請吃的有十餘家，結果先到一家鄉老那裏去吃，因為被團半天，暫時得一休息之所，七八人開始飲飲了。

數巡辭飲之後，一位鄉老嘆了一口氣說：做生意折本，開支不能節省，捐款接二連三地派收，大年小夜，沒有收入，怎麼應付呢？

你嗎，比我好得多，我才零死少條麵，活支不能活，只好聽吃官司，宣告破產，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一個做糧食生意的老板說。

自己已吃了八號頭拆息作本做生意，而生意這般清談，物價逐日上漲，全家開支已不能維持，更加多防捐，保安捐，軍隊草料捐，營業稅捐，印花稅捐，所得稅捐，區鄉保甲經費捐，房租捐，清潔衛生捐，咳！捐得我昏天黑地，又不能不捐。

好在鎮長先生在座，請他就待一下，明年繳吧！我對鎮長說。

咳！「不當公人，天下太平」，我已辭職六次，終辭不掉，上面催逼得非常緊，我已築繳了廿餘萬，還在催逼，我也沒有辦法！鎮長說。

×先生：這個局面究竟要到什麼時候停止呢？我雖種了二十畝田，現在每畝田運用費要繳三十斤左右，被徵數在十担左右，叫我那裏繳得起？我一個大兒子已被抽中籤，家中少了一箇重要的當家人，必須請人種田，請一個長工要十五担米，還要先繳半數，各種項款又重捐，種田人還有命嗎？

我聽得說：廢了皇帝改了民國就能安享樂業了，不料民國世界比皇帝世界加了幾萬倍的難過，我且想自己活到怎大年歲還不早死，眼看著子子孫孫受罪，怎麼辦呢？我想非有真命天子出來，這世界決不能太平！張老伯慨嘆地說。

不！現在雖號稱民國，實際還不是民國，在這國家多難，兵荒潦亂的時代，一切不上軌道，國家未有生養休息的機會，關支浩繁，不捐老百姓，那裏來開支呢？皇帝時代若遇這樣的局勢，也要向老百姓捐的；我們的祖先在皇帝時代過的苦日子，或許比現在更甚，我們不知道罷了！我對他們解釋。

唔，我知道你不贊成我的看法，你們老太爺

在時，他就會贊成我說的不錯！皇帝時代，如果做官的這樣亂攪錢，已不知斫了多少腦筋敢這樣糊糊頭倒做嗎？那個時候的錢糧，多收一文錢都要殺頭的，你沒有經歷過不曉得那時候的利害，我親眼看見過的，難道騙你嗎！

現在做官的人，聽說幾萬幾萬幾萬的貪贓，這個數目我也弄不清楚，總之數目大到數不清，誰殺他們的頭？

我小時候聽說：乾隆時候的權相和珅和嘉慶時候的好相穆章阿，權勢傾天下，財富如皇帝，當時誰不怕他們？結果不都斫了頭嗎？現在只要有本事括，把老百姓括到要死不活，他們安富尊榮，有誰斫了頭呢？所以我說：在民國世界，子子孫孫都沒有出頭的日子了！

你可以根據事實去起訴呀！我帶滑稽的態度對他說。

告狀，嚇！那末真活得不耐煩，自招滅門之禍了！要遲一還債，馬上就有顏色看，誰敢告！他憤憤地說。在皇帝時候早就有人告他們了，現在的官司打得嗎？動一動就破家，不管理理由如何充足，證據如何確實，沒有錢一樣坐監！

一個畏獄的徐鎮長插嘴說：張老伯伯說事實不說他是一個老農，連公親和我也不能多嘴！譬如要去告他們，把確實證據附呈上去，衙門裏先提原告到庭三推六問；發差使來，處處要錢，貼工夫賄用費，鄉人不論做生意和種田，工夫都很寶貴，走上走下的被傳也就够吃虧了！做倖依法辦理，那麼還好，假如他們官官相護，來一個三查四覆，時間拖長，受累無窮，結果是證據不足，不但白費金錢氣力，而且還結了不解之纏。

，被告進一張報告反坐口狀子，他們既做官，外面交際廣闊，人事熟識，機變繁多，我們鄉裏人吃得住嗎？

即這樁事吃了你的虧，證據確實，無法抵賴他輸了可沒有死罷，一弄手段出來了，他們空閒無事，無中生有。牽藤掛葛，陷害一個鄉人極爲容易，鄉人消息不通，人事生疎，到那裏去伸冤？即使弄到事情大白，也免不了家破人亡，所以眼睁睁吃小虧，還是幸福，誰敢出首告狀？鬧出事來，身陷囹圄，用錢更多，不如種種眼前安益，出點捐錢了事，免得招冤惹禍，蒙受飛災，也就好了！

他們固然吃虧，我們何嘗不吃虧呢？連你的令親也不能免，難道不敢和他們鬥嗎？不然！在這年頭，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我們住在鄉間，實在沒空閒和他們周旋！

時間已深夜，就此散局。

(四)自治還沒播種

接連數日忙於時應，偶然談到自治問題，可憐！憲法已定今年十二月廿五日施行，鄉人連這名字都不知道，內容更不容說。

有不少大中學畢業生，都在教育界服務，和他們談起憲法，多數不感興趣！

什麼法都是雙子的耳朵，擺在頭上看的，一點作用也沒有！中國的法制大都完備，誰照他做來？有錢有勢的，做強盜也合法；沒錢沒勢的，守法就是犯法。要談憲法，先要把政府已經頒行的各種法律嚴格執行，事事依法辦理，才能引起人民尊重憲法的心理，政府和司法衙門，都認錢爲法律，雖制十部憲法也是徒然！

即如教育經費，卅五年上學期，僅發了兩個月，連買水吃也不够，誰有氣力來談什麼憲法！這種言論，雖然是激於現實的反映，但政治上軌道，引起全國人民心理的失望，確是國家前途的重大危機！

談到自治問題，更覺模糊了！鄉鎮長還不知道有鄉保民大會的組織，所以鄉民只好讓他們宰割了！

今年十二月廿五日要行憲了，自治機構還沒下種，怎樣辦選舉產生合法的議會，更從什麼地方去行憲？

各政黨紛紛擾擾的鬧着民主，而把民主的種子埋在九霄雲外，到什麼地方去行施民主？無根草木，不能昭蘇，國家無根，豈不危哉！

(五)回棧

有一日早晨，到另一家茶館去吃茶，偶一抬頭，見對面牆壁上貼着江陰縣公安局標語，共計十二條，其中有五條印着「×××者殺」，不禁愕然！公安局雖爲維持地方治安的機關，似乎國家未會予以殺人之權，然而反覆細看，明明印着「江陰縣公安局製」的大字，於此，也可見縣政的一班了！

因爲我急於返滬，連日被父老兄弟們圍着訴苦，回鄉應做的一件事也沒有做，然而更慚愧的是：他們告訴我許多痛苦，一件也無力給他們解決，只有匆匆忙忙地向上海逃遁了！

卅六年一月廿五日寫於滬滬客次

(本文接自第六面)

雖然這樣，但尼赫魯在印度國家主義運動中仍然是個支配的人物，其的地位僅次於甘地。而甘地的人格和哲學之感化國民大會黨，亦僅次於甘地而已。甘地已指定他爲繼承人，而且在他就任印度第一次民選的行政會議副主席典禮中，甘地稱他爲「無冕之王」。至於其納，他是回教聯盟的領袖，發言人，戰略家，統帥，唯一的支配人物。

在政治技術方面，他們兩人亦各不相同。尼赫魯向羣衆演說印度獨立和統一時，隨時從他的記憶中運用抽象的觀念，加以改變，以求羣衆明瞭。其納是個極端的鬥爭者，絕不屈服於人，他常反覆高呼口號，煽動宗教情緒以及鼓吹不妥協的要求。

尼赫魯雖然生在印度教徒家庭中，但他不願提起宗教色彩；在若干程度中，他要避免許多印度政治家的惡憤情緒。回教聯盟的報紙和演說家常站在黨派立場攻擊甘地，巴特爾及國民大會黨次要的領袖，而比較少攻擊尼赫魯，這一點不能不特別指出。

尼赫魯看不起其納的學問才能，而且視他爲印度的勞力力量，整個國民大會黨對他的態度，尤其如此，所以反對他更厲害。

在將來，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可能有一道溝通聯合的橋樑，即是尼赫魯的政治傾向，趨於社會主義，而且他的印度經濟復興言論，會感動一部分以爲印度教徒享受較豐的財富，較好的教育，而本身是被壓迫的回教徒。

(譯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日紐約時報週刊)